

*Fu Shan's World: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 
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.* By Qianshen Bai.

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03. xxii+338pp.

何炎泉\*

白謙慎，出生於 1955 年，北京大學政治學系畢業，1996 年獲得耶魯大學藝術史博士學位。曾任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助教，密西根大學藝術系副教授，現為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副教授。已發表多篇有關八世紀至二十世紀，中國書法史及篆刻史的論文。其研究除了關注其他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果外，更積極地希望能啟發其他領域的學者，為當前書法史界最出色且最重要的學者。白謙慎個人亦為著名書法、篆刻家，1982 年獲大陸地區大學生書法競賽一等獎。1983 年，擔任大陸地區全國中青年書法篆刻展覽評審委員。現為中國滄浪書社社員，書法作品曾多次參加重大展覽。

此書的出版無疑為中國書法史的研究注入新血，打破了長久以來偏重風格史的侷限，將眼光放置於更宏觀的視野中。作者在紮實的風格分析基礎上，積極拓展其他相關領域的研究，從文化、政治及社會等各個層面來切入，試圖忠實地還原傅山當時所生活的時空脈絡。藉助詳實且縝密的脈絡鋪陳，對於傅山書法的時代及個人意義加以探討，更以傅山為中心來釐清十七世紀書法品味轉變的方向與原因。儘管作者所使用的脈絡式研究亦是書法史家經常採用的方法之一，然而卻有著品質上的顯著差異。就現階段的研究狀況看來，

---

\*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

多數論文中所能提供的脈絡，通常不會與普通常識差距太遠，往往落於概論式的抄襲描述。因此，白謙慎於書中所運用的脈絡式研究，就可以為書法史研究者提供一個相當優良的示範。

由於傅山生活的年代正好跨越明清之際，因此白謙慎首先處理晚明時期書法與其他文化現象之間的關係，指出相當多前人未發之議論。例如，晚明興盛的篆刻如何對書法產生影響，及晚明書家在面對典範性書蹟時，在觀念上與前人有著哪些根本的差異。時代進入清初後，作者便積極討論傅山的政治立場，更是旁徵博引地探索出傅山的書法品味，及書法理論中所隱含的政治意義。此外，關於明遺民與清官員之間的緊密互動，書中亦作了相當深入的研究，重新詮釋當時的贊助行為所具有的特殊意義。同時，作者也明確指出傅山作品中所遺留的晚明文化品味，說明這個貫穿明末清初的文化發展趨勢所代表的不同時代意義。接著，白謙慎開始論及清初學術風氣的轉變，對書法的品味造成何種影響，及金石書法的產生契機。最後作者認為，清代新學術風氣誕生的同時，新的書法風尚也伴隨著出現，書中更以傅山行草作品為例，具體實際說明當時的金石書風新要素。

作者在考慮書法作品的時代意義時，亦能謹慎地關注到同時期的其他文化現象，使得書法不至於被孤立於外，而是與整個時代融合為有機的一體。例如，在面對傅山「四寧四勿」中的「支離」美學觀時，除了兼顧文學傳統及其書法風格外，更對傅山的畫作進行深入的討論，也對同時代的石濤與髡殘的畫作及他們的思想觀念作整體的考量，指出書畫之間所共同享有的時代審美意義。處理傅山的雜書卷時，在關聯到晚明印刷作品的表現及閱讀方式之餘，更將眼光延伸至晚明人士對生活的態度及晚明小品文的特殊性。造成影響的來源可能來自四面八方，過於簡單的推論方法，除了無法解決問題外，還會引發不必要的誤解。因此，作者如此寬廣且豐富的研究視角，確實成功地使書法史的研究往前邁進不少，具體說明了影響源的可能性與複雜性。如此的研究態度，正是當前書法史界流行的簡單式推論作法所欠缺的，或許在

不久的將來可以見到較正面的回應。

此外，白謙慎在處理傅山書法時，亦適切地顧及同時期的書家及書法現象。明亡前的時期，作者在討論傅山的尚「奇」書風時，並未忽視王鐸、黃道周及倪元璐作品中的相同要素。入清後，除介紹傅山對碑學的貢獻外，更是不偏頗地對待山西以外地區（江南地區為主）的書家及金石書法的發展，並且給予適度的關懷。書中藉由探索南北兩批文人之間的接觸狀況，試圖呈現一個清晰的學術交遊網絡，以理解當時這股全國性書法品味的分佈及流傳。這種對同時代書家給予整體性考量的作法，不僅使傅山個人不至於被孤立，對於傅山的書法在當時的地位及貢獻，也能有一個更明確的比較基準點。

目前書史界的文章，除了以上所提到的部份缺失外，對於何謂書法的風格分析，依然存在著相當多的歧見。一般而言，書法的風格分析容易流於類型學的範圍，尤其是當研究者使用筆畫的外形來作比較，或是對字形結構作分析之時。畢竟，線條外形或是結構上的模仿並不難，這種外觀上的分析幾乎可以說是徒勞無功，而且也不需經由藝術史家來完成。如果不談線條的品質，不考慮書家對空間的觀念，無法藉由線條來還原書家書寫時的筆法動作，那所有外觀上的簡單分析，相信只要視覺上沒有障礙的人應該都能完成。唯有超越外觀形式上的分析才是有效力的風格分析，否則只是一堆沒有意義的瑣碎描述及比較而已。而作者於書中所展示的，就是精確地從線條的品質、書家的筆法動作，及書寫的觀念等超越於外觀形式的風格要素，來進行作品的風格分析，完全避開類型學分析所會產生的模糊性及無效性。例如，作者在考慮傅山楷書與北齊碑刻的關係時，就令人信服地從書寫觀念及書寫動作的一致性，來證明兩者之間所可能具有的風格淵源。因此，對於何謂書法的風格分析，或許還需要更嚴格地加以定義，才能避免與類型學混淆的情況。

書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必須提出，就是作者在面對傅山書法時，能獨具慧眼地看到中國書法史中相當特殊的應酬脈絡。有關書法的應酬在過去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，但作者對應酬與書風表現之間可能的對應關係，作了

相當多精闢的說明。正視應酬書法脈絡的存在，無疑可以使研究視野延伸至書家的書寫情境與心態的重建，對於書作的分類也提供了新準則。由於應酬行為久已存在，所以書史研究者所面對的書蹟中，肯定是混雜著大量的應酬作品而未被分離開來。在作品性格無法正確掌握的情況下，從分類未妥善的材料中所能得出的推論，當然很容易就會偏離事實。因此，作者提出書法中的應酬脈絡，確實可以為日趨僵化的書史研究，提供另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向。

除了以上的介紹之外，全書還有很多精闢的論述，所提到的觀點也都相當有創見且具說服力，然而有兩個部份或許還值得再深入討論。一個就是關於書蹟中漲墨的使用，是否真如白謙慎所提出，漲墨乃是受到篆刻藝術的啟發，被書家藉以表現作品的金石氣。

作者指出，晚明時期篆刻藝術中所追求的古樸殘破美感，乃直接對書法表現造成影響，也就是當時書家（王鐸、傅山）行草作品中所經常出現的漲墨。這種說法的提出的確令人耳目一新，而且經由視覺直觀來檢驗，將之與印拓中因侵蝕所產生的字口模糊效果相比較，也都相當吻合一致。篆刻藝術中之所以追求殘破的美感，與「印宗秦漢」的觀念有關，因為在晚明所見到的秦漢印，大多歷經一千多年的歲月侵蝕，自然產生出殘破古樸之美。同樣的美感也可以在碑刻拓本中見到，其中則以篆隸作品為多。因此，若論及篆刻對書法的影響，首先令書家聯想到的書體應當為篆隸，畢竟同樣的效果在篆隸拓本中亦經常出現。所以，書家將篆刻中的效果移植到書法的過程中，或許要先從篆隸作品中著手才合理，而不會是相關性較薄弱的行草。事實上，晚明的篆隸書蹟中並未有明顯使用漲墨的概念，這說明行草的漲墨筆法可能並非源自於篆刻中的殘破美感，而是另有其他的脈絡。在行草的書寫傳統中，一直到乾、嘉碑學興起為止，古樸殘破的金石氣皆非書家所追求的主流審美趣味，主要的表現線條還是傳統的流暢形式。到了碑學興盛之際，由於受到篆隸作品中成功地引入金石氣的激勵，才開始在沉重傳統包袱的行草作品上追求相同的美感。因此，從碑學書法發展的進程來看，漲墨與金石書風的聯

結確實顯得過於牽強。

爲了加強說服力，白謙慎更舉出鄭篋隸書作品中的漲墨用筆，來說明清初隸書亦是藉由此種用筆來追求金石氣。由於鄭篋對於碑學的提倡不遺餘力，可說是有意識地學習漢隸，因此當然能夠合理地推測其漲墨的使用與碑學有關。利用鄭篋再往上追溯至晚明書家行草中的漲墨，作者再次證明漲墨與篆刻及碑刻之間的關聯性。然而，筆者並未詳加考慮書體差異所可能產生的不同意義，從王鐸及傅山的隸書作品中缺乏類似的漲墨用筆來看，鄭篋的例子就相當值得深思。如果晚明行草的漲墨與鄭篋隸書中的漲墨同爲金石氣追求的表現，則王鐸與傅山的隸書就應該要有漲墨出現。若晚明書家所使用的漲墨觀念並非來自篆刻的金石氣，顯然鄭篋隸書中的漲墨就不見得是來自於篆刻或碑刻的影響，而可能僅是源自於晚明草書中的書寫概念。關於鄭篋的隸書及傅山的篆書中所出現的草法，作者本身也認爲乃是承襲自晚明草書的傳統。因此，鄭篋隸書中出現晚明草書漲墨的用筆，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部份。至於鄭篋運用於隸書中的晚明漲墨之法，是否被鄭篋有意識地藉以表現金石氣則不得而知。

因此，白謙慎對於晚明及清初書家作品中漲墨所提出的新觀點，確實有必要再詳加考慮。

另一個則是關於傅山晚年在行草作品中加入篆隸筆法的問題。作者詳細地討論王鐸與傅山的草書，指出他們之間在筆法上的根本差異。王鐸乃是傳統帖學系統的書家，因此在草書的轉折處多使用源自於唐楷的「提按」動作，而傅山則是碑學書法的倡導者，因此在草書中多使用源自於篆隸的「使轉」筆法。儘管傅山與王鐸書風間的相似性是無庸置疑，不過作者卻積極想從筆法上來論證他們書寫觀念上的不同，也就是帖學與碑學筆法上的相異。

至於傅山是否真如作者所論，將習自篆隸的筆法應用於行草之中，除了書中舉出的例證外，恐怕還要從其書風的發展來瞭解。關於傅山隸書的風格發展，書中並未詳細介紹，故對於其超越唐人隸法之實際年代及狀況無法得

知，難以用來檢驗傅山行草作品摻入隸書筆法的發展變化。儘管如此，從書中所舉出傅山的早期行草作品中看來，已經可以發現多使用「使轉」而較少「提按」的喜好及趨勢，故晚年繼續發展也相當合理，並不一定非要和篆隸筆法有關。所以，傅山作品中所謂的篆隸筆法，或許並非真正受到篆隸筆法的影響，只是屬於傅山行草書風發展過程中所自然產生的特色，而恰好與後來所發展出的篆隸筆法接近。

這兩點意見對於傅山提倡碑學的貢獻並不會有所動搖，只是對於傅山的行草是否受到碑學的具體影響提出質疑。

整體而言，此書的出版的確是意味著，書法史研究已經不能再自限於風格史，必須要跨足其他相關領域，才可能利用傳統的風格分析作出新貢獻。當然，長久以來那些佔據書法史界了無新意的抄襲文章，也希望可以在此書出版的激勵下，能有些許的反省與改變。